

# 浙江省生育意愿、生育水平调查结果评析

尹文耀 叶明德 谢雷光 李旭日

**【提要】** 本文对浙江省已婚育龄妇女和未婚青年的生育意愿调查进行了分析,认为浙江省育龄妇女的期望孩子数仍高于政策要求的水平,这与以往相比没有重大变化;但群众还是接受了现行生育政策,并按政策要求进行了生育。本文根据未婚青年生育意愿进步的情况和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估计未来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现行政策将更加接近。但因工作松懈或政策不当,引起生育率反弹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本文还系统分析了要稳定低生育水平,使群众意愿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要求相统一,在生育政策上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一些问题。

**【作者】** 尹文耀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叶明德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谢雷光 浙江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科员;李旭日 浙江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人员。

浙江省是全国计划生育比较先进的省。若出生性别比以 110 计,浙江省生育率于 1978 年开始低于更替水平(2.22)(翟振武等,2000),至今已有 22 年时间。世纪之交,结合实际对浙江生育意愿、生育水平和国家生育政策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和分析,对 21 世纪做好全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保持稳定的低生育水平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一、已婚育龄妇女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水平

1999 年 4 月,我们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计划生育工作好、中、差三种情况,采用分层限额抽样的方法,在浙北萧山市、浙南玉环县、青田县的 9 个村,对已婚育龄群众的生育意愿进行了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 506 份。被调查的已婚育龄妇女平均年龄 35.5 岁。调查结果如下:

### (一) 生育数量

被调查已婚育龄妇女主张生一个孩子的占 18.0%;主张生两个孩子的占 77.5%;主张生三个孩子的占 4.3%;其他占 0.2%。平均期望孩子数为 1.86(见表 1)。从总体看,期望孩子数在更替水平以下。分地区看,这次调查与 80 年代同类地区调查结果相比,平均期望孩子数只有微小的减少。例如,本次调查:萧山市平均期望孩子数为 1.82,1986 年杭州市计生委在杭州市所属 7 个县(含萧山)调查为 1.84;本次调查,玉环县平均期望孩子数为 1.71,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新昌县 1986 年调查为 1.72(陈丁宽,1986),金华市 1988 年调查为 1.77<sup>①</sup>,绍兴县 1988 年为 1.77(陈坤木、楼永苗,1988);本次调查,经济欠发达的青田县平均期望孩子数为 2.05,同样为浙江省贫困县的磐安县 1992 年为 2.07。但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地区期望孩子数之间的差别基本没变,高于政策要求水平(1.5)的幅度也基本没变。

① 根据王涤:《关于当前婚育观念变化的几个突出问题的探析》,《浙江人口通讯》,1988 年第 3 期计算。

## （二）孩子性别

被调查的已婚育龄妇女对孩子的性别是有所追求的(见表2),无性别偏好的人只占26.9%;只要男孩不要女孩或只要女孩不要男孩的更是少数,分别占8.3%和3.0%;61.7%的人追求男女双全,其中追求一男一女的占追求男女双全的94.21%。在希望有男孩的人中,有将近一半的人坚持非要男孩不可,而另一半人则有弹性,有男孩最好,没有也不强求。在三个调查点中,经济较落后或传统意识较浓的青田县男孩偏好刚性最强。从总体上看,一定要男孩者在被调查对象中也是少数,占34.78%。调查数据表明,有人养老送终是刻意追求男孩的首要原因。其次,有生产和生活需求方面的现实原因,也有习俗和传统观念方面的原因。

## （三）初婚和初育年龄

从调查的情况看,无论是经济较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育龄妇女中58.6%主张晚婚,主张早婚早育的人为数很少。已婚育龄妇女生育间隔选择3年以上者占88.6%,其中选择3~4年的人占67.2%。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5年。选择更短或更长间隔期的人比较少。地区之间有些差异,但总体区别不大。

## （四）生育意愿、生育政策与生育水平

多种方法测算结果表明,浙江省总和生育率80年代后期为1.6,略高于政策要求的水平;90年代基本稳定在1.5以下,略低于政策要求的水平。506名被调查育龄妇女,平均实有子女1.5个,与测算结果基本相符,也与政策要求的平均生育水平一致。1990年普查时,浙江省平均初育年龄为23.12岁,生第二个孩子的平均年龄为26.64岁,生育间隔为3.52年。妇女的生育年龄和间隔,也基本符合现行政策要求。

这表明,尽管80年代以来群众的生育意愿(主要是生育数量)一直高于政策要求的水平,但群众在事实上还是接受了现行生育政策,进入90年代更能普遍按政策要求进行生育。

表1 期望孩子数调查结果

	已婚育龄妇女		未婚青年					
	人数	%	合计		男性		女性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合 计	506	100.0	120	100.0	61	100.0	59	100.0
生一孩	91	18.0	77	64.2	37	60.7	40	67.8
生二孩	392	77.5	40	33.3	22	36.1	18	30.5
生三孩	22	4.3	0	0.0	0	0.0	0	0.0
不生育	1	0.2	3	2.5	2	3.3	1	1.7
平均期望孩子数	1.86		1.31		1.33		1.29	

表2 对孩子性别选择的调查结果

	已婚育龄妇女		未婚青年					
	人数	%	合计		男性		女性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偏 男	42	8.3	11	9.2	6	9.8	5	8.5
偏 女	15	3.0	10	8.3	3	4.9	7	11.9
儿女双全	312	61.7	32	26.7	18	29.5	14	23.7
无偏好	136	26.9	64	53.3	32	52.5	32	54.2
不生育	1	0.2	3	2.5	2	3.3	1	1.7
合 计	506	100.0	120	100.0	61	100.0	59	100.0

## 二、未来群众生育意愿估计

1999年4月,我们在对已婚育龄群众的生育意愿调查的同时,还在调查地就生育意愿召开了20个未婚青年座谈会(男女分开,每个座谈会邀请6人参加)。通过座谈讨论、当场填写问卷等对未婚青年的生育意愿进行了调查。参加座谈的未婚青年有企业职工、城乡社会青年和在校高中学生。在他们畅谈自己意愿的同时,也请他们对周围其他青年的意愿进行估计。我们可以参照未婚青年自己的生育意愿和他们对周围其他青年生育意愿的估计,推测未来生育人群的生育意愿。

### (一) 未婚青年对孩子数量的意愿

参加座谈的未婚青年平均年龄20.2岁。其中60%以上主张终身只生一个孩子,约1/3的人主张生两上孩子,个别人打算终身不育,无一人主张多生多育。他们的平均期望孩子数为1.31,比已婚育龄妇女明显减少,低于政策要求的水平。按未婚青年估计计算,他们周围的其他青年想生两个的约占55%,平均期望孩子数为1.58。被调查的男性未婚青年估计周围其他青年的平均期望孩子数为1.62,被调查的女性未婚青年估计为1.55。

通过座谈,我们了解到,未婚青年及其周围青年期望孩子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1. 青年一代全局观念增强了,对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性认识更深刻了。参加座谈的未婚青年都表示,他们的观念与父母相比已有所不同。他们认为多生孩子,于国于己都不利。但也有一部分人处于矛盾的心态之中:从个人考虑,觉得以生两个孩子为好,最好是一男一女;从整个国家着想,应当只生一个。如果政策规定只生一个,他们认为能理解和接受。

2.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孩子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上升,已成为影响青年一代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如:他们认为如今抚养费用大,培养一个孩子差不多要花去一个人的全部工资,靠夫妻两人的工资培养两个孩子,负担过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激烈,孩子不在于多而在于培养得好,否则将来就业成问题。

3. 对生活的追求多样化,对生活质量要求更高,看到了多生孩子与这些追求的矛盾。他们认为,生育和抚养孩子需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多生孩子会影响自身的发展和享受。

4. 出于对孩子养老保障的经济价值和精神慰藉价值边际效应递减的认识和判断。他们认为,只生一个孩子可以趁年轻力壮之时多积点钱,年老时就不必像长辈那样依赖子女。生孩子多,反而会减少自己的养老积蓄,增加对子女的依靠。而想要两个孩子的人认为,独生子女太孤单,容易形成孤僻的性格;从养老角度看一个孩子将来负担太重,两个孩子,尤其是一男一女,比较理想。被调查的未婚青年中有不少是独生子女,他们感受较深的一是有孤独感,常常渴望自己能有一位哥哥或姐姐;二是长辈们对他们的期望很高,使他们感到压力很大。

### (二) 未婚青年对孩子性别的希望

被调查的未婚青年有53.3%对生男生女问题抱无所谓的态度,26.7%追求儿女双全,还有8%~9%的人有男孩或女孩偏好(见表2)。被调查青年估计周围其他青年无性别偏好的占56%,追求儿女双全的占38.8%,有男孩偏好或女孩偏好的分别占3.4%和1.7%。未婚青年对孩子,以无性别偏好占多数(53.3%~56.0%),比育龄妇女高出26.4个百分点。

女儿地位的提高和对家庭贡献的增大,是未婚青年性别偏好减弱的重要原因。他们认为在农村,喜欢女儿的人正一天天多起来。一方面,女儿帮娘家的现象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担心儿媳不孝。

### (三) 未婚青年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意愿

未婚青年全部主张晚婚。有93.6%的男青年、46.7%的女青年主张26岁或26岁以上结婚。主张晚婚者的主要理由是:结婚生孩子的费用高,应先立业后成家,打好经济基础;晚婚有利于个人事

业的发展和个人享受,也有利于身体健康和优生。

但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事实婚龄比被调查青年的意向婚龄要早,非法同居、事实婚姻、未婚先孕的现象不少;文化程度较低的人通常结婚较早,也有存在早育现象。在他们的周围不少人对非法同居持默认态度。

由于被调查的青年基本上主张晚婚,60.7%的男性、41.7%的女性认为婚后的生育应任其自然,不必加以控制。但21.0%的男性,53.3%的女性主张结婚后过三、四年再生育。也有个别青年打算终身不育。

#### (四) 未来群众生育意愿估计

与当前已婚育龄妇女相比,未婚青年对孩子数量的要求与政策要求的水平更接近;追求“一男一女”的在已婚育龄妇女中是多数,在未婚青年中只是少数;主张晚婚的,在已婚育龄妇女中是多数,在未婚青年中是全部。未婚青年中男女青年相比,女青年期望孩子数少于男青年,追求儿女双全的比例低于男青年,无性别偏好的比例高于男青年,偏爱女孩的比重高于男青年,主张婚后一两年生育的比例低于男青年。女青年生育意愿进步更大。

应该说明的是,未婚青年尚未到实际决定生育的时候,他们的生育意愿多少有些理想化的成分。也许他们接触实际后,会比调查时更实际一些,比如像他们估计的周围其他青年一样,期望的孩子数会略高一些。即使如此,他们期望的孩子数也比已婚育龄妇女明显地降低了。

从宏观背景看,浙江省总和在校率1990年为7.92年,到1997年上升为9.76年,7年间增加1.84年。按这种总和在校率发展速度推算,2010年左右,人均在校受教育年数有望接近90年代初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1992年为1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4)。这既有利于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大批人才,又有利于促进生育意愿的进步。

1998年浙江省从业人员非农化水平达57.5%,略高于1990~1992年发展中国家的中等发展水平(5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4);1996年城乡居民的总体生活水平已进入小康(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等,1998);城市化水平达35%左右,至2020年将达到45%~50%。浙江省的产权改革已基本完成,经济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产业重组,市场自由度进一步提高,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逐渐完善,竞争加剧的新发展时期,对生产和管理的科学技术水平、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人们更多地注重自己劳动技能和子女文化科学素质的提高,而不是数量的增加。调查表明,这些已经对青年的生育意愿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7年以来,浙江省在杭州、宁波市城区和萧山、绍兴等7个县(市),逐步实行计划生育管理“三项改革”和优质服务试点,简化一孩生育审批程序,用《生殖健康服务证》替代《生育证》,开展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由群众根据法规和政策要求,自主决定结婚年龄、生育年龄、避孕措施,政府则主要根据群众的需求提供优质服务。目前这一改革已扩大到40多个县、市、区。同时,以建设文明、幸福新家庭为宗旨,以少生快富工程和教育强智工程为重点的“新家庭计划”活动也已在全省普遍展开。这些均为生育意愿的进步和巩固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因此,可以认为,浙江省未来生育人群的生育意愿,将会比当前育龄妇女有更大的进步,群众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接受现行生育政策,并按照现行生育政策进行生育。

但也应该看到,仍有相当部分人的生育数量意愿、孩子性别意愿,与现行生育政策可能提供的选择机会存在一定距离。另外,较早执行只生一个孩子政策的独生子女家庭,其优点和缺点正日渐显露出来。独生子女家庭的示范作用和自身感受,将是影响周围人们及独生子女本人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如只生一个孩子的弊端十分突出,周围群众接受现行生育政策的思想就会动摇。所以,因工作松懈或政策不当产生生育率反弹的可能性依然很大。要使家庭和个人生育意愿与宏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相统一,使未婚青年的生育意愿,变成他们的实际生育行为,并巩固到他们的育龄期结束,还有很多实际工作要做。

### 三、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稳定低生育水平,避免因政策不当产生生育率反弹的情况发生,也使家庭和个人生育意愿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要求更加统一,在生育政策上需要进一步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 (一) 现行生育政策没有明确其实行的期限,未能确定未来各种人群的生育政策

本次被调查育龄妇女 77.5% 的人愿意生育两个孩子,希望一男一女的占被调查总数的 58.1%,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分别占 58.3% 和 57.1%,非常接近。未婚青年估计周围其他青年有 55% 的人想要两个孩子。这些都显示了群众这种心愿的高度趋同性。因此,生两个孩子或“一男一女,儿女双全”仍是群众的基本生育意愿。但是,现行生育政策中只规定了独生子女间婚配的生育政策,没有明确规定其他多种婚配模式(如独生女与非独生男婚配、独生男与非独生女婚配)的生育政策;对独生子女间婚配所生子女的生育政策没有明确规定,对其他婚配模式所生子女的生育政策也没有规定,没有明确“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执行多长时间或几代人,没有明确何时才能满足人们的基本意愿,允许人们在生一个还是生两个中间自由选择。

#### (二) 农村宽于城市,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增加了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成本

由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家庭的生产生活条件不同,人的思想意识和认识水平不同,在一个阶段内城乡生育政策不同,是有合理性的。但城乡有别、农村宽于城市,长期下去,对经济社会发展将很不利。我们利用浙江省育龄夫妇信息网提供的资料,按近似现行生育政策<sup>①</sup>推算结果表明,如将独生子女间婚配生的两个子女作为非独生子女看待,按非独生子女的要求进行生育,城乡有别,农村宽于城市,农村生育率高于城市的情况将长期存在下去(见表 3)。这将提高非农化、工业化、第三产业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的职业转移成本、人口迁移成本、进城人口与城市社会整合成本等多种成本。同时有不少人宁愿在农村享受较宽松的生育政策,也不愿进城市为享受现代文明而少生孩子。因此农村宽于城市,至少在现阶段对城市化不是积极推动,而是形成了一种障碍,进而对人口的行业、职业和地域结构的进步起到一种阻滞作用。

#### (三) 某些政策条文不利于人口素质提高

政策条文中:“一胎为非遗传性残疾的经批准可再生育第二胎”的规定。这一政策长期执行有可能对“零素质”人口的增长起到“促进”作用。首先,仅仅限制遗传性残疾的二胎生育是不全面的。医学和实践反复证明,发生过出生残疾的,如果致残因素不消除,不是遗传性残疾,再发的风险也远高于常人。其次,目前浙江省县、市、区级的医疗机构对非遗传性残疾的诊疗技术普遍较为低下,广大地区对这类疾病的认识和诊断手段极其有限,由县、市、区级的医疗机构负责鉴定存在极大的风险。另外,部分人假借这条政策,将遗传性残疾篡改为非遗传性残疾,以图再生。另外,部分确有实际困难的农民和渔民生育二胎的规定,使教育资源相对不足的地区出生人口所占比重上升较快,儿童能够接受较好教育的机会较少,对人口文化素质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 (四) 现行生育政策内在的公平性、补偿性、保障性需要进一步确定

企图依靠奖惩,取得计划生育户和超计划生育户的平等或公正是不可可能的。一是奖惩难兑现,尤

① 现行生育政策中包括十几种允许生两个孩子的规定,没有规定独生子女间婚配所生子女(独生子女的后代)生育政策。模拟中只包括了现行生育政策中独生子女间婚配允许生两个孩子的政策要求,未能包括其他十几种允许生两个孩子的规定;并将独生子女间婚配生的两个子女理解为非独生子女,他(她)们婚配后的生育政策与非独生子女间婚配相同,故这只是与现行政策相近似的一种方案。具体政策内容是:独生子女间婚配生两个,独生子女间婚配所生子女、其他婚配模式及其子女城市普遍生一个,农村第一个为男孩的只生一个、第一个为女孩的可生两个。

其是在农村。二是即使奖惩兑现了,奖励不能替补少生的孩子,惩罚不能消除已经多生的孩子。三是,目前意义上的奖惩,实质上只具有象征性的教育意义和一定程度的约束意义,不具有全额补偿和完全保障的意义。依靠这种奖惩,难以纠正执行和不执行生育政策给家庭造成的种种不平等。

#### (五) 人口指标、生育政策与相对合理规模缺乏有机的联系

生育政策与人口指标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和系统的测算,人口指标与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所要求的相对合理的人口规模与生育水平之间,也缺乏有机的联系和系统的测算。生育政策、人口控制指标、相对合理的人口规模三者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实现控制指标,不一定符合政策或全国和本地区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执行了政策,不一定能达到理想的控制目标;要符合全国、也符合本地可持续发展要求,就不一定符合现行政策和指标。如果在未来,政策不与人口指标相统一,依法行政、按政策行政,将是一句空话。

表3 近似现行生育政策下浙江省的城乡总和生育率

年代	独生子女间婚配最大概率率下的总和生育率			独生子女间婚配最小概率率下的总和生育率		
	城市	农村	合计	城市	农村	合计
2000	1.3655	1.5019	1.4494	1.0782	1.4781	1.3242
2010	1.3962	1.5278	1.4621	1.3602	1.4785	1.4194
2020	1.1809	1.5126	1.3145	1.1859	1.4785	1.3037
2030	1.0946	1.4924	1.2259	1.0132	1.4784	1.1667
2040	1.2253	1.4872	1.2969	1.0451	1.4784	1.1634
2050	1.2829	1.4851	1.3215	1.4956	1.4785	1.4924
2060	1.1950	1.4853	1.2385	1.3340	1.4786	1.3557
2070	1.1617	1.4844	1.2101	1.0280	1.4783	1.0955
2080	1.2118	1.4848	1.2527	0.9975	1.4786	1.0696
2090	1.2248	1.4847	1.2638	1.3873	1.4785	1.4009
2100	1.2002	1.4842	1.2428	1.4458	1.4782	1.4507

表4 浙江省市、地出生性别比和计划生育率

地区别	出生性别比				计划生育率	
	合 计	1989 上半年	1989 下半年	1990 上半年	1989 年	1990 年
全 省	117.64	117.65	116.73	118.83	94.85	96.97
湖州市*	104.66	106.42	103.94	103.95	97.56	98.49
嘉兴市*	104.88	104.95	104.18	105.63	98.94	99.20
舟山市*	105.34	108.21	104.56	103.35	96.59	98.02
杭州市*	108.82	108.55	108.49	109.40	97.93	98.89
余杭县	103.00	101.60	101.72	106.31	99.75	99.82
绍兴市*	109.95	110.31	107.99	112.25	97.45	98.14
丽水市	111.92	110.17	114.69	110.68	76.77	93.15
宁波市*	112.23	110.96	112.18	113.72	97.89	98.96
衢州市	115.23	116.61	111.37	119.24	96.29	94.43
金华市	121.20	122.56	119.42	122.01	94.70	96.76
台州地区	128.89	126.43	129.56	130.85	92.54	95.75
温州市	144.87	142.86	144.00	148.41	92.41	93.76

\* “开小口”时实行双轨控制的地区。

资料来源:(1) 出生性别比数据来源于浙江省人口普查办公室:《浙江省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 年,146~153 页;(2) 计划生育率来源于浙江省计划生育委员会:《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4)》,第 183~188 页。

### (六) 出生性别比偏高与现行生育政策有着某种联系

从时间上看,浙江省出生婴儿性别比异常始于 80 年代初期计划生育政策从“晚、稀、少”转向普遍实施一孩政策之际。从历年计划生育统计数据上看,一孩性别比正常,二孩明显增高,三孩奇高。从清查和补报的出生人口分析,女婴数也是较低的。从地域上看,出生婴儿性别比城市正常,农村偏高。1990 年人口普查时,浙江省市、地出生性别比在 110 以下的五个市,均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浙北地区(见表 4)。

这五个市,恰恰是在“开小口”时,实行双轨控制<sup>①</sup>的地区。由于指标是根据原来“开小口”之前的政策下达的,“开小口”后没有增加,再加上这些地区对计划外生育控制能力较强,计划生育率较高,使不少独女户因没有指标而不能生育;同时由于这些地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不少家庭主动放弃二胎指标,只有女孩的母亲生第二个孩子的比例很小,从而使母亲选择出生孩子性别的机会也减少。这就成为这些地区出生性别比低于未实行双轨控制而“开小口”地区的重要原因。杭州市余杭县(现为余杭市)是 1990 年普查时浙江全省未“开小口”的县。1989 年和 1990 年上半年合计,出生性别比仅有 103,远远低于“开小口”的地区,也低于实行“双轨控制”的其他地区。这些均表明,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与现行生育政策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 (七) 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各项具体政策缺乏协同互补的功能

现行生育数量政策、生育年龄政策(晚婚晚育)、生育间隔政策,目标都是集中在尽量减少出生人口的数量上,没有考虑到利用生育数量政策减少出生人口,利用生育年龄和间隔政策,调整人口的年龄结构,降低家庭和社会的负担系数,使控制人口数量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

现行的生育政策是计划生育系统掌握的,现行的迁移政策是公安部门、人事部门、劳动部门和城市人口控制部门掌握的。生育政策和迁移政策的制定、执行相互分离。事实上,生育与迁移之间互相影响,并共同影响地区的人口数量、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要实现人口与当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统盘考虑生育和迁移两个方面,使二者统一起来,共同为“适度的人口总量、优良的人口质量、合理的人口结构”目标服务。而现行生育政策、特别是地区性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很少将二者结合起来,共同考虑,形成有机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体系。

在 21 世纪,如何将宏观政策与群众意愿结合起来,使生育政策内含一种内在的公平性、保障性、补偿性机制,更科学可行,更受群众欢迎,更能产生多种效力,能在广大地区长期稳定地执行,是当今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与计生工作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一项重大历史使命。

### 参考文献:

1. 翟振武、刘爽、陈卫、段成荣:《稳定低生育水平:概念、理论与战略》,《人口研究》,2000 年第 3 期。
2. 陈丁宽:《山区农民生育意愿调查分析》,《浙江人口通讯》,1986 年第 3 期。
3. 陈坤木、楼永苗:《现行生育政策与群众生育意愿存在一定差距的原因与对策初探》,《浙江人口通讯》,1988 年第 3 期。
4.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1994)》,第 160、186 页。
5. 中共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等:《浙江社会发展 20 年》,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62 页。

(本文责任编辑: 朱 犁)

① “要实行双轨的人口控制,既要通过人口包干指标控制,保证指标不突破,又必须严格执行省政府规定的具体政策”,见《关于多胎和超计划二胎得到有效控制的市县农村完善具体生育政策的通知》(浙政发[1986] 41 号)。